

韩光党史工作文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

韩光党史工作文集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韩光党史工作文集

编 者/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

主 编/陆 毅

责任编辑/郑世铨 王春明

封面设计/金 英

版式设计/郑 刚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友谊印刷经营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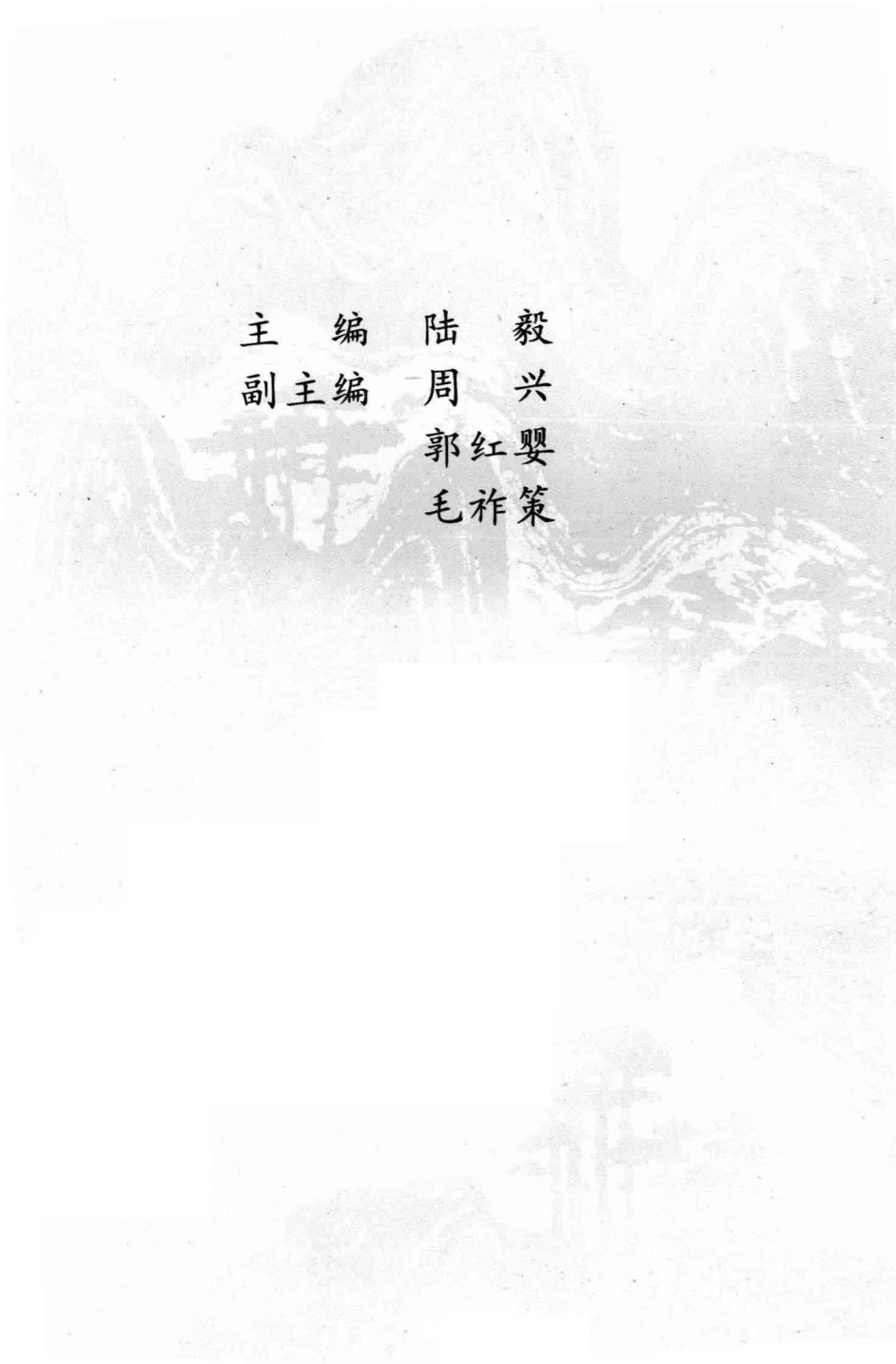
850×1168mm 32开 19.5印张 390千字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册

ISBN 7-5037-0365-9/K·129

定价：29.00元（平装） 定价：38.00元（精装）



主 编 陆 毅
副主编 周 兴
郭红 婴
毛祚 策

目 录

前 言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
-----------	-------------------------------

党史工作意义重大 主动服务义不容辞

(1982年8月23日)	(1)
--------------------	-----

中央一贯关心东北人民解放斗争

(1982年8月23日)	(19)
--------------------	------

关于旅大地区解放初期若干情况的说明

(1983年2月4日)	(33)
-------------------	------

把工作重点转到重点征集和专题研究上来

(1983年8月26日)	(40)
--------------------	------

东北抗日联军始终坚持战斗在抗日疆场

(1984年5月8日)	(46)
-------------------	------

注意研究东北抗联历史问题

(1984年8月)	(57)
-----------------	------

在东北抗联历史问题座谈会准备会议上的讲话

(1985年3月11日)	(68)
--------------------	------

纪念东北的爱国主义先驱者

(1985年5月9日)	(73)
-------------------	------

遵循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解决历史争论问题

(1985年7月15日)	(77)
--------------------	------

党史工作意义重大 主动服务义不容辞*

(1982年8月23日·沈阳)

我来参加这次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第一是学习，第二是服务。让我作报告，不敢当。这些天，听了许多同志的发言，很有收获。很多从前没有听到的，这次听到了，这是学习。今天我来讲点史料，算是服务吧。这次到会的老同志有27位，被邀请的还有十几位未能到会。此外，没被邀请的在东北地区工作过的老同志还相当多。如果有机会让大家讲，都会讲出一些很宝贵的史料。我这两天深深地体会到，不少老同志只要把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一段历史讲出来，就可以反映当时党史的一个侧面，都是很宝贵的。我在小组会上虽然插了几句话，但是还没有系统地讲。现在给我这个大会发言的机会，准备讲三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前一段工作较忙，未能充分地做准备，只能粗略地谈谈，提供一些我能提供的党史某些段落的资料。

* 这是韩光同志在东北三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这次会议开始，他接受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委托，兼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东北组组长。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撤销后，他仍继续关注东北地区的党史与抗联史的宣传与研究工作的。

一、“八·一五”日本投降前党在东北的活动

东北三省，特别是哈尔滨地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实践活动都是比较早的，同南方一些先进省份相比，不算晚。过去一般都认为，东北地区比较落后。最近一个时期，接触了东北三省搞党史的同志提供的一些材料，才知道自己过去的认识不太对。由于东北与俄国毗邻，大体上在1918年、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巨浪冲击到“中东路”（帝俄时代称作“东清铁路”），对哈尔滨及“中东路”沿线懂得俄语的知识分子，首先发生了影响。十月革命期间，很多白俄人跑了过来，这些人的言行有意无意地告诉我国人民，俄国在闹共产主义，也起到了传播十月革命影响的作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也很快影响到东北一些大城市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从关内来的影响，据材料记载，主要是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同志陆续派了几个同志，如吴丽石、陈为人、李振瀛等，大约在1923年前后来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几个城市，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从前天唐宏经同志的发言可以看出，1924年前后，大连市随着工人斗争和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党和团的组织也就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共产党建立之前，一般都经过一段启蒙运动时期，如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工人运动兴起等。1923年以前这段，

可否作为东北党史的第一个时期，称为启蒙运动时期。

东北地区党的组织与活动，早在1923年、1924年就有了，当然是比较零散的，没有统一的像后来满洲省委那样的一个组织。1925年、1926年，党的组织在大连、沈阳、哈尔滨等地都活动起来，有的叫地委，有的叫市委，有的叫支部。除了大中城市外，党的组织也发展延伸到像穆棱等一些县镇。当然，主要还是在铁路沿线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关于满洲省委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历来说法不一。这次会上，苏子元和唐宏经同志回忆，认为是在1927年10月成立的。苏子元同志特别说到，是根据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成立的。当时，东北几个城市的党组织，如哈尔滨、沈阳、大连等，是分别派代表到汉口参加“五大”的。会中，有人讲到，东北三省党的组织和活动已有一定基础，应当成立统一的满洲省委。可见，苏子元同志提供的这条史料，说服力很强。过去看到的资料，有的说满洲省委是陈为人等1923年在哈尔滨成立的。成立不久，组织遭破坏，他们又转移到沈阳、大连去活动。1925年回哈，试图再成立省委，没有结果，最后在1927年才成立的。对于这种说法，这次老同志座谈时大都认为是不可能的。大家认为，全东北地区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的成立，还是在1927年10月，根据更可靠。

从1923年到1927年，我把它划为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党的活动主要在城市里，在工人里，在学校里。那时，我们的同志教书的不少。

1928年起，省委的力量逐渐得到加强。党的组织也逐

步由城市伸进农村。在南满、北满、东满，在一些县的农民中间，陆续建立了党的支部、特支、县委、中心县委，以及这三个地区的特委也相继成立了。这样，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城市和农村自上而下形成了党的组织系统：省委、特委、地委、县委、中心县委、特支、支部。1928年至1930年这三年中，党的组织虽然遭到过破坏，但总的说，还是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广泛地领导和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

1931年“九·一八”以后，党的工作开始了新的转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武装斗争成了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当然，在“九·一八”之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南满、东满地区就已经开始了小规模武装斗争，组织了红军游击队。当时我们是向中央苏区、向中国工农红军学习，凡是工作基础好的农村，都想成立苏维埃政权。当然，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还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或第五天，党中央就公开发出了文告，号召武装抗日。就在这同时，蒋介石却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党中央号召武装抗日，蒋介石命令不抵抗，成为鲜明的对照。东北人民当然不听蒋介石那一套，从1931年底开始，纷纷拿起武器抵抗日军的进攻。例如，有李杜、马占山、苏炳文、唐聚五等相继率部抗日，还有各种群众抗日武装在各地广泛活动。

这一阶段，我们党在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积极组建和扩大我党自己领导的武装队伍。二、派干部到民众抗日武装队伍，如抗日救国军、自

卫军、义勇军中去工作，宣传、影响他们，引导他们坚决抗日。三、派干部到伪军中去组织伪军起义。例如，在1932年底到1933年初，珠河中心县委曾派干部打进伪军驻苇沙河镇的温团，成功地组织了哗变。1933年秋，磐石中心县委也成功地组织了驻在烟筒山的伪军第十四团迫击炮连哗变，加入了南满红军游击队。四、派干部到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自发武装、半武装组织中去工作。这些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32年至1934年，在北满、吉东、东满、南满，我党全力组织和进行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在南满磐石县正式成立。在此基础上，不久又联合了17个非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于1934年1月建立起东北抗联第一军。成立抗联第一军，是经过有17支队伍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决定成立的。会上大家一致推选杨靖宇为司令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的名称就是这时第一次叫出去的。1934年到1935年，抗联第二军在东满、第三军在北满陆续组建起来。北满赵尚志的第三军，是在1935年底或1936年初，部队离开珠河地区，到了江北之后组建完成的。在这之前还是叫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宁安、吉东地区1934年先成立了抗日同盟军，1935年或稍后些时，才组建为抗联第五军。第六军组建得要晚一点，可能是在1936年底或1937年初。总之，1933年至1935年，各地抗日武装斗争深入发展，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已经完全掌握在我党的手里。

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日军不仅在乡村加强了对我游

击根据地和我军的进攻、围剿，而且在城市也不断破坏我党的组织，捕杀我们的领导干部。加之，省委和党中央（当时在上海）也断绝了联系，省委活动已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1935年夏，满洲省委即发出了书面通知，要抗联各军，以及抗联所在地区的党的领导机关，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1935年底，满洲省委撤销了。

以上，从1928年至1935年，可以划为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从工人转到农民，从地下秘密活动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

1935年底满洲省委撤销后，进入了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直到1945年9月，东北局在沈阳开始办公为止，整个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在这艰苦的10年里，东北抗联各军，一是靠本军党的组织和指挥员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二是靠各军之间的自觉合作；三是在1935年至1937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杨松）同志为代表，主要与抗联第五军、第四军，与党的吉东特委联系，并通过吉东地区对北满、东满地区给以指导，给以精神支持。

这里需要讲讲有关最后一任满洲省委领导关系变化的情况。杨光华同志是满洲省委最后一任省委书记，他的工作时期是1934年10月到1935年4月。他写的材料我看过，他一上任就受双重领导。一是党中央（在上海），一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1933年到1934年间，党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不久又随同红军长征，越走越远。因此，与满洲省委失掉了联系，是可以理解的。同

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的联系，本来可以继续下去，但省委接连接到中共代表团由王明、康生署名的两次电令，指示撤销满洲省委。这是杨光华同志说的。这些情况，以前我没听说过。还在省委撤销之前，中共代表团就派吴平同志越过乌苏里江和兴凯湖，与吉东特委及抗联五军、四军取得了联系，这点上边已提到。吴平同志来吉东，不仅向吉东地区党组织传达“王、康（中共代表团）指示”，而且通过吉东特委向珠河地区、北满地区，向赵尚志同志指挥的第三军以及我党领导的其他各军，转达“王、康指示”。曾有同志发问，为什么吴平只到吉东？为什么中共代表团的指示总是经过吉东特委转达？这就是因为吉东地区独有的“地利”，交通联络方便，即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例如，1935年11月，我在珠河，在三军工作，吉东特委突然派来一个老交通员，带着中共代表团调我去莫斯科的电令。后来就是这个老交通员把我接送到苏联的。

满洲省委撤销后，抗联和抗联活动地区原有的党组织并没有等待，没有束手无策。地方党和抗联的领导同志们经过讨论，曾以民主推选的方式，首先成立了北满临时省委。其后在中共代表团代表吴平的授意下，准备成立北满、吉东、东满、南满四个省委。不久，由于南满地区形势恶化，鞭长莫及，情报难通，南满省委一直没搞起来。于是又有北满、吉东和东（南）满三个省委之称。1936年春，以赵尚志同志为首，在第三军活动的地区，成立起北满临时省委，随后即派朱新阳同志去莫斯科，向中共代表团汇报。第一，表示他们不同意“王康指示信”的精神，认为这是

右的。第二，要求代表团批准成立北满临时省委。但是没有得到回答，朱新阳也被留在莫斯科，送学校学习去了。

由于形势的发展，到了1942年，这几个省委实际已不存在了。这时越境去苏联的一部分抗联部队组成了个“国际旅”，即八十八旅。在八十八旅工作的十几位领导干部，感到还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党组织，经过协商成立了“东北党委员会”。

在这个时期的前期，即1936年至1938年，抗日武装斗争一度轰轰烈烈，有过一段大的发展。东北抗联这时曾发展到11个军。1938年，军事上有过一次“西征”。决定西征，主观上是要避免敌人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角地区——即通称的三江地区实行的“围渊捕鱼”（围剿）。但西征后，几个主力部队进入敌人腹地，人地生疏，敌强我弱，又无外援，因此，我军受到巨大损失。

1939年、1940年，日军加紧对我抗联的进攻。同时，这个时期，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国内抗日战争形势，都处于困难时期，存在着一股逆流。这不能不影响到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抗战的前途，以及要不要把东北抗联的旗帜继续打下去，有的同志就开始发生了怀疑和动摇。特别在1940年、1941年间，这种思潮更为明显。这是一次大的争论。1941年，抗联的几位领导同志在苏联召开了党的联席会议，用了约一个月时间，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辩论。开始争论得很激烈，最后还是取得了一致。一致决定，坚持东北抗联这面旗帜，直到最后胜利。会议还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主要是两条，一是抗联主力

隐蔽整训。这就是以后成立的八十八旅，或叫国际旅。二是另组建15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十五六个人、二十来个人。他们的任务是，执行军事侦察；宣传和联系群众；扰乱敌人后方和破坏敌军交通线等。这十四五个小分队的活动，一直坚持到“八·一五”日军投降。日本投降的前夜，他们还派人出来执行任务，其活动地区主要在北满和吉东地区。有一位同志叫夏立亭，现在机械工业部一个单位工作，前不久我还见过他，1945年“八·一五”日本已经投降数日了，他还带着电台在牡丹江山区执行任务，我们抗联的部队随同苏军进入牡丹江市后，给他们打电报，才把他们召回来的。我补充一句，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日本人宣传“赫赫战果”，说什么“抗联被消灭了”，“共产党也没有了”，等等。抗联小分队坚持战斗的事实，彻底拆穿了敌人的谎言。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九·一八”以后，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就是1936年到1945年的10年。这10年中，东北地区各大城市，党的工作失掉了省委的领导，遭到很大破坏。没有被日伪警察捕杀的党员，大多与党失掉了联系，潜伏了下来。党在城市的工作，同样处于最低潮。

但是，为了驱逐日寇，收复失地，解放全东北，我党领导下的一些部门和地区，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其中，由中央部门直接领导的有“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设在延安的“东北工作委员会”（简称“延安东委”）、设在晋察冀边区的“东北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委”），以及我情报工作系统、山东地区（特别是胶东地区）和冀东地区

等党的组织，都或多或少地派干部潜入东北（伪满）进行地下活动。

“东总”开始活动于1936年至1937年，前期主要在北平、重庆等蒋管区活动，提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团结流亡在关内的东北中上层人士、知识分子，一时发生很大影响。后期，1939年以后，“东总”总部设在延安，具体主持这个工作的是刘澜波、张希尧等同志。

“延安东委”，1939年中央决定设立的，任务是研究伪满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设法了解东北抗联各军活动情况，可能时打通联系；研究我党在伪满开辟与建立工作的方法。具体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李延禄和李范五同志。

“东委”，1941年冬，中央为了迅速开展东北（伪满）地下建党工作，决定设立“东委”。由于晋察冀边区毗邻东北，工作条件好，“东委”机关设在晋察冀，它的任务是从延安和晋察冀抽调有条件去东北工作的干部，经过秘密工作训练后，派到东北（伪满）做地下建党工作。中央决定，“东委”设领导小组，程子华（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任组长，我和刘仁（分局组织部长）任副组长。我主持“东委”日常工作。“东委”于1942年7月在晋察冀开始办公，直到1945年8月，共派了数十名干部，潜入长春、沈阳、营口、承德、哈尔滨、抚顺、阜新、辽南盘山等地进行工作。

我情报工作系统，一直重视在伪满地区的工作，特别是抗战后期。在座的钟子云同志、毛诚同志，都是主管这方面工作的。

胶东地区党组织，在1944年前后，向大连市、旅顺市

派去相当数量的地下工作者，其中有左友文、张世岚、赤霞等同志。

晋察冀边区的几个区党委——冀西、冀晋、冀热辽、冀中等区党委，以及若干有条件做东北工作的地委和县委，或设“东委”，或指定专人，负责东北工作。

上述部门、地区、方面，头绪虽多，但工作方针都是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政策，深入日伪腹地，蓄积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配合反攻。

此外，还有两种力量，不容忽略。一是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宋黎和高锦明同志正在整理史料。二是1936年前后，在我党同志影响下，李杜在关内搞的“东北抗日联军总部”，李曾被委任为总司令。据说，蒋介石曾允许给李装备12个轻武器师（并未实现，实是哄他）。李两度去莫斯科，想取得苏联援助，从北面“打回老家去”。当时参与此事的有董麟阁、李延禄、苏子元等同志。

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东北抗联的部队，部分先遣敌后，作侦察战；大部则随同苏军进军。很快，我八路军、新四军，分别从热河、华北、山东，兼程进兵东北。这时，无论是在伪满时期日伪警宪漏捕、漏杀的我地下党员，或是抗战后期我党派去做地下工作的干部，都纷纷就地与我党、我军接上关系，配合进行解放东北的战斗。

1945年9月，东北局在沈阳开始办公。从此，东北人民解放战争，展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时期党史资料征集问题，已经是另一个大题目了，是

这次会上第三组座谈的题目，我这里先不讲。

关于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我是新兵。这方面，三省史料研究的部门和同志，已做了大量工作，写了很多材料，还出了书，我读到过一些。这次会上，又听到几位早期入党的老同志，讲了那时的情况，获益非浅。下面，想再重复说一下，1945年前，党在东北地区的活动，拟分为四个时期，提出来商讨。

①1922年及其前，5年左右，共产主义运动启蒙期。

②1923年—1927年，5年，党的活动主要在城市，在工人、知识分子中；几个大城市和若干县镇有了党、团组织和党员，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满洲省委。

③1928年—1935年，8年，党的活动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由工人转向农民，由地下活动转向武装斗争为主。

④1936年—1945年8月，10年，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和组织系统；斗争进程非常复杂、曲折，大体是：从高潮→低潮→准备再起→配合反攻。

以上这些，作为史料的线索、头绪，提出来，仍是抛砖引玉。不妥处，请同志们指正。

二、“八·一五”后党在 大连初期活动情况

这是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征委)给我出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对辽宁、对大连的同志来说，可